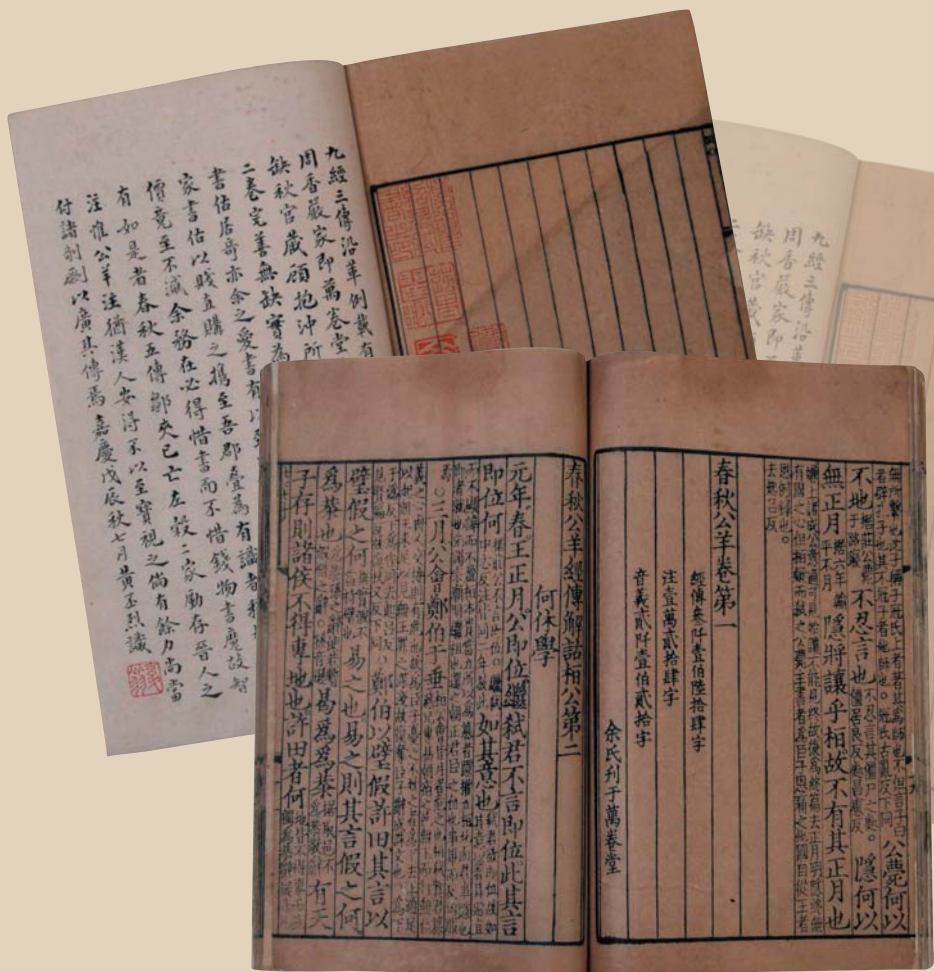


眾裡尋它

談南宋建安余仁仲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吳璧雍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是一部解釋《春秋公羊經傳》的書。南宋紹熙二年至四年間（一一九一—一一九三），建安書商余仁仲刊刻此書，並覆校修版，不但字畫端嚴有法，而且紙墨精良，因此成為藏書家眼中的珍罕極品。

緒言

南宋建安余仁仲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存世極稀，除本院藏有完整一帙外，大概僅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另一部（卷十二部份抄配）。國立故宮博物院此部係得自沈仲濤先生之捐贈，故於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舉辦「宋版書特展」時即公開展示，同年並出版《宋版書特展目錄》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

本圖錄》，且於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悉仿原書，複製出版。

也許是資訊不夠暢通，一九九四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的《宋版書敘錄》（李致忠著），其中《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的敘錄末段有言：「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那部，則不知還在人間否？」一九九七年六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古代刻書》，則隻字未提此書之存佚；至二〇〇二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任繼愈主編的《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其中黃鎮偉所撰《坊刻本》一書依然說：「一部曾經黃丕烈百宋一廬、瞿氏鐵琴銅劍樓遞藏，後上海涵芬樓影印刊入《四部叢刊》，而原本下落不明，未知尚存天壤間否？」可見二十餘年已過，知者似仍不多，故借《文物月刊》一隅重新介紹，為關心此書存佚者傳達其安在的訊息。

經傳與解詁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是一

部解釋《春秋公羊經傳》的書，《孟子·滕文公下》記：「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這是孔子「作《春秋》」最早的記載，自此之後，孔子有無「作《春秋》」似成了懸案，一直爭論不休，但無論孔子是否作、著、修或筆削《春秋》，基本上，《春秋》文簡而義深，如果沒有人解釋疏通，根本很難了解其中的旨意。《漢書·藝文志》著錄當時解釋《春秋》有五家，可惜「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所以今天流傳下來的只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而已。其中《公羊傳》的解經，被認為最以孔子筆削春秋、具有微言大義為前提，對當時的典章制度、人物行事，能用自創的道德價值系統，去評判善惡是非、功過得失之作；但往往過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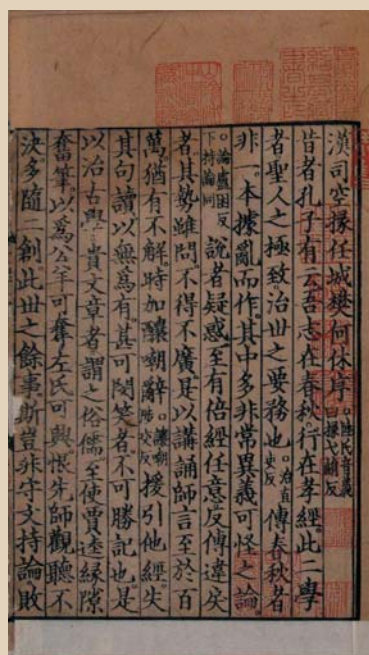
字斟句酌，不免瑣碎，甚至罔顧史實，失之穿鑿。

按《漢書》作者班固認為：《公羊傳》的作者為公羊子，齊人；唐顏師古有注曰：「名高」，但都沒有確切的證據。漢武帝時，由於皇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了五經博士，其中的《春秋》，因董氏撰《春秋繁露》以公羊傳義為藍本，所以《公羊傳》先立學官。傳至東漢，任城樊（今山東曲阜）人何休，不滿當世末學好引圖讖、不據學理的種種無稽之說，遂捨棄《繁露》的評論體，另上溯西漢另一位解《春秋》的學者胡毋生所用條例，以注經體的形式撰成《解詁》，自成一家的言，後世稱「何休學」，意即何休所述之謂。

何休字邵公，《後漢書·儒林傳》說他「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後因連坐太傅陳蕃黨禍，



余氏刻書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首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據說覃思不窺門者有十七年，《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撰成，可謂集兩漢《公羊》學之大成。東漢以後，公羊學不顯。一直到唐代，陸德明才又作《釋音》，徐彥作《疏》，並且將十二卷析為二十八卷，即所謂《春秋公羊傳注疏》，這是後世比較通行的注解本，像本書這樣單刻《解詁》比較罕見。

版本特色

是第十二卷，所根據的應該還是唐石經的次第。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欄。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此書十二卷，但未題版本為何；同為南宋時人岳珂，校刊《九經》時，曾經參酌多種版本，認為興國于氏和建安余氏二本最稱精善。故宮此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即當年岳氏所推崇的建安余氏刊《九經》之一。

本書首冠「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序後附余氏刻書跋曰：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不同，如此序釀朝，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哈，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度，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

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六百多年後，清人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爲此本作校勘，曾云：「鄂州官書，經注本最爲精美，今考此本足以考訂鄂本者頗多。」當時鐵琴銅劍樓主人瞿鏞，就以阮元所列一一校驗之，果然皆以此本爲長，則余氏所謂「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云云，絕非虛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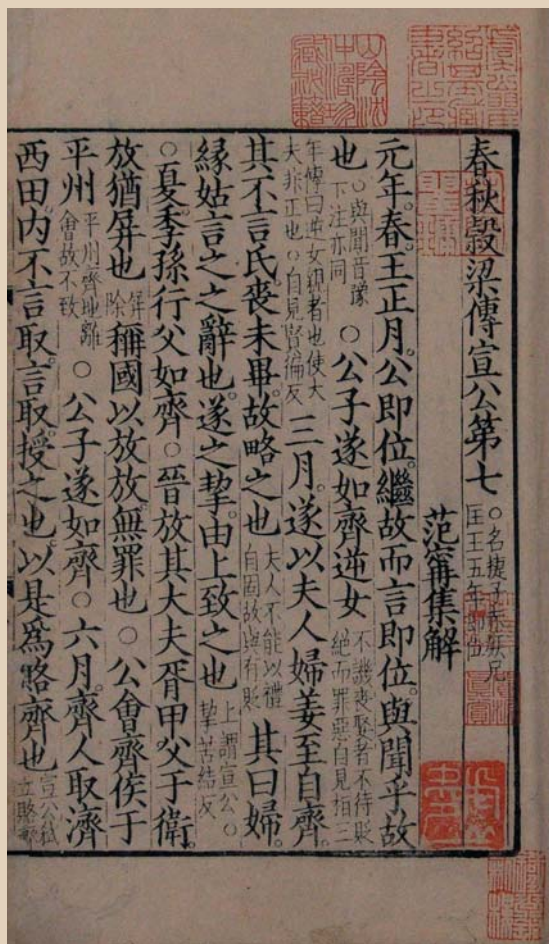
是書於經下即接傳文，注雙行，釋文分附注後，並於每卷尾題後記經傳、注、音義之字數，但形式各有不同。如卷一末版於字數後刊「余氏刊於萬卷堂」，卷二、卷六末版形式相近，皆三行並排鐫字數，後刊「余仁仲刊於家塾」；卷三的字數形式因紙幅不夠，變成縱行連刊，且置於格欄外；卷四字數又恢復三行並排鐫刻，但下刻「仁仲比較訖」；卷七、卷八、卷十一亦皆有「仁仲比較訖」字樣，但鐫刻經傳、注、音義字數的形式亦因紙幅而異，如卷七、卷十一爲並排鐫刻，卷八則爲雙行小字縱行連刊。其餘卷五、卷十以雙行小字的形式單刻字數於末行尾題下；卷九又並排鐫刻；卷十二形式與卷二、卷六相同，但隔行另刊「癸丑仲秋重校」六字，癸丑是紹熙四年，因此知此書於紹熙二年雕鏤後，經二年，復重校再行刊版，可見余仁仲刻書態度之嚴謹。其字畫端嚴有法，楮墨精妙，堪稱閩刻中之佳作。



卷六末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一末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春秋穀梁傳集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先祖余煥始遷居閩中，至十四世移居建安的書林，開始以刊書為業，這時大約是北宋。此後，族人即使分居別地，亦多以刻書為業，其中余仁仲的萬卷堂在南宋聲名最著，刻不少經書供文人操觚射鵠之用。

遞藏脈絡

故宮所藏是帙之末附有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黃丕烈（一七六三～一八二五）手書題跋，云：

初是書出鎮江蔣春農家，書估以賤直購之，攜至吾郡，疊為有識者稱贊，故索價竟至不減。余務在必得，惜書而不惜錢物，書魔故智，有如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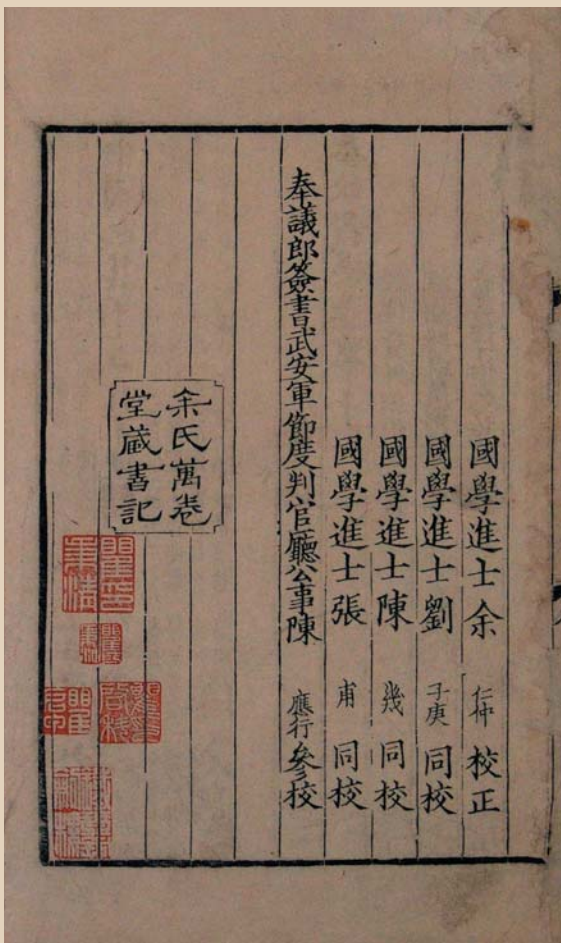
最後，黃丕烈以白金二百二十兩購入，隨即鈐上「士禮居」、「丕烈」、「蕘夫」、「復翁」等章。

黃氏跋文所提蔣春農即蔣宗海（一七二〇～一七九六），江蘇鎮江人，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

按故宮另藏一余氏刊《九經》本《春秋穀梁傳集解》，其卷終不但刻印隸體木記：「余氏萬卷堂藏書記」一方，且並排署名「國學進士余仁仲校正」、「國學進士劉子庚同校」、「國學進士陳幾同校」、「國學進士張甫同校」，及頂格「奉議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應行參校」，共五行。此「國學進士」似透露著，余仁仲不只是一名單純的書商，他也可能

是一名國子監的生員，但未必中過進士。不過，無論其真偽如何，這樣的署名，肯定可以提高書坊的地位，同時，也比較有機會和士人交往，得到較多出版上的利益。

考建安余氏書業，大概是中國雕版印刷史上從業最長的出版商，從北宋一直到清初，皆可見建安余氏家族所刻之書。根據清乾隆時余廷勳所呈余氏族譜，知



春秋穀梁傳集解卷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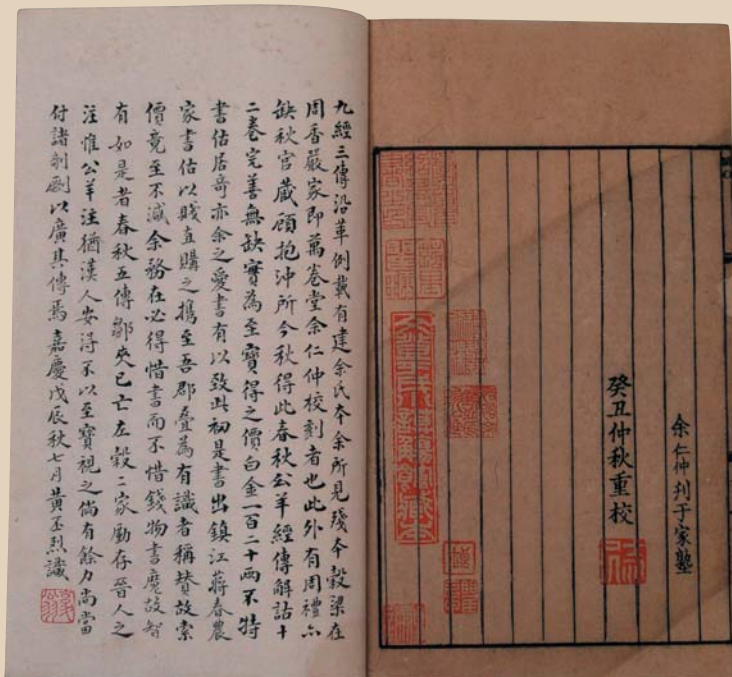
進士，出江右裘曰修之門，善古文，工篆刻，雅好金石，亦富藏書，與僑居杭州的藏書家汪啓淑（二七二八—一七九九）頗有往來，啓淑說他「年僅四十即乞養里居，歷二十餘年不出。或甘旨不繼，賣文以自給。」也許這是蔣氏最後以賤價售予書估的原因吧，但可怪的是，此本並無任何蔣氏藏書章。

由書中累累鈐印，則自清初以後的遞藏脈絡或大略可知。最早應為季振宜，按中國國家圖書館別藏本，其上亦有季氏藏書印，則季氏當時可能收有兩部，其中一帙為蔣春農購得，另一部也許成為徐乾學的插架之物。當蔣氏將書售予書估而為黃丕烈得之，不過十餘年的光陰，黃丕烈的全部藏書也開始散出，此本為

藝芸精舍的汪士鐘所得，汪氏除鈐自己的藏書印外，其族人汪振勳（號梅泉、眉泉）亦鈐章其上。咸豐初，似一度成為山東藏書家于昌進（約一八一〇—一八六三）小謨觴館的珍藏品，未幾，可能轉售給鐵琴銅劍樓的瞿家，按瞿鏞較早期的書目《恬裕齋藏書記》已著錄此書，由卷前所附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宋鳳翔序推測，此書應該在咸豐七年之前就收入瞿家的恬裕齋，瞿鏞後來還用此本校勘道光四年揚州問禮堂汪孟慈所翻刻的同一款式《經傳解詁》，並將校錄結果附於《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五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條後，「俾覽者無惑焉」。約八十年後，此本竟由滬上商人沈仲濤購得，最後捐贈本院。

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上有近人跋文三篇，其中李盛鐸跋稱：

今世所存宋槧諸經版本，依岳氏《沿革》所舉，惟有



卷十二末版及黃丕烈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蜀大字本、撫州本、建安余氏本。但蜀本不列刊校人名，無可證驗。撫州公庫《禮記》，今在海源閣，烏秘不可得見。余仁仲本《周官》，亦只殘佚。惟《公》、《穀》二傳，烜赫

人間。自蕘圃、閻源遞相傳寶，卒歸虞山瞿氏。百年轉徙，未出吳中。同時汪孟慈太守，別得《公羊》一本，付之影刊。據瞿氏《藏書志》所校，知翻本頗有刊改，未為盡善。

李氏跋文寫於民國四年（一

九一五），文中所指烜赫人間之《公羊傳》及《穀梁傳》即院藏二本，當時猶在瞿氏手中。汪孟慈別得《公羊》一本（即問禮堂翻刻的底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據傳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

所加按語，稱「此建本之精者，袁寒雲以三千金得之李新吾。」袁寒雲，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佞宋成癖，當時（民國四年）以三千金得之，即先後寫了跋文二則，其文有二云：

此《公羊》即汪刻祖本，阮元所見缺兩葉者，慕邢為余購致。爰據瞿氏校勘記校定此本，補葉之脫誤。

翌年四月又補跋云：

此葉所據，絕非出自余氏原本，又不若卷六補葉之舊，因依瞿氏校勘記改定之。茲取瞿校與此本細參，而瞿本頗多增改，且尾有重校訖一行，是必為重修本也。故此葉之異同兩存之。

由於無緣得見袁氏藏本，尚不知初刻本和重校本的差異處有多少，但知卷三之經傳、注、音義縱行連刊，並不在欄外，確與院藏本不同，故可以肯定此重校本

